

裴高才 / 著



胡秋原

从抗战巨笔到两岸
『破冰人』

本书叙介了胡秋原的家世、求学、流亡、笔舌生涯与参政议政岁月
生动地刻画了人物鲜明的个性
反映其八十年间对国家民族始终不渝的爱心、忧心、苦心和诚心
艺术地再现了胡秋原这位文坛奇士的卓异历程

裴高才 / 著

胡冰石

从抗战巨笔到两岸
『破冰人』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秋原：从抗战巨笔到两岸“破冰人” / 裴高才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2
ISBN 978-7-5108-3222-2

I. ①胡… II. ①裴… III. ①胡秋原(1910—2004)
— 传记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9017号

胡秋原：从抗战巨笔到两岸“破冰人”

作 者	裴高才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6
字 数	38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222-2
定 价	7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胡秋原先生是我所最敬佩的
中國學者之一，他努力促成
祖國海峽兩岸的統一，批
判台獨，主張祖國的謬
論；他竭盡全力弘揚
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
他為中華人民立了功
特談數語，以表高山
仰止之忱。

季羨林



季羨林教授生前題詞

弘揚祖國傳統文化
促進兩岸和平統一

題賀

胡秋原傳出版

錢偉長



第四至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上海大学
校长钱伟长教授生前题词

一水盈盈，照逝波別時苦比聚時
 多炎黃的烈千秋史華夏新功
 兩拜敬為有襟懷窺皎月敢傾
 肝膽答先河風聲萬里非空擲
 指日同揮一禦侮戈

秋原先生以耄耋不群，艱險為祖國統一大業
 奔走呼號，披瀝日月，直聲動天地，今秋先生
 重訪母校武漢大學，把晤甚歡，謹呈一律以申
 敬慕之忱

一九八八年十月四日

陶德麟書於漢山



武汉大学前校长、著名哲学家陶德麟教授题诗

有筆頭千字
胸中萬卷

錄蘇東坡《赴密州早行馬上
寄子由》句以祝頌秋原公
「身長健，但優游卒歲」。

余傳韜敬書

癸未年深秋

海峡精禽赤子心

贾亦斌

读者案头的这部著作，叙介了胡秋原的家世、求学、流亡、笔舌生涯与参政议政岁月，生动地刻画了人物鲜明的个性，反映其 80 年间对国家民族始终不渝的爱心、忧心、苦心和诚心，艺术地再现了胡秋原的卓异历程。

胡秋原（1910—2004 年）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教授和政论家，历任国民参政员、《中央日报》副总主笔、国民党资深“立委”、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员与“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等。他从十四五岁开始发表文章，在长达七八十年的笔耕生涯中，著作等身，达三千万言，内容涉及政治、哲学、历史和文化多个领域，名噪中外。我最钦佩的是，他始终信守“人格、民族和学问三大尊严”。在他身上，不仅有博大精深的学问，而且继承和发扬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传统精神。相交多年，秋原兄给我印象最深的主要表现在：第一，他是一个真正爱国者，坚决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愈挫愈勇，百折不挠；第二，他是台湾岛内首倡祖国统一的人，冒险犯难，老而弥坚；第三，他对中华民族文化有深邃的研究，而且提出深受国内外重视的“超越论”（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超越传统）。

胡秋原热爱祖国，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任何形式的侵略，是贯穿这部传记的突出主题。秋原兄一介书生，对关乎国家民族利益的大事，他都不顾个人利益安危，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其爱国之切、忧

国之深、谋国之忠，常有催人泪下难以自己者。

书中披露，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秋原即主张抗日救国。1928年，当时他年仅18岁，出版了处女作《日本侵略下之满蒙》，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九一八”事变发生，他闻讯后愤然放弃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公费留学的待遇，立即留沪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参与发起组织了“中国著作者抗日联合会”，起草了著名的《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一致抗日”。当时上海文化界名流几乎都在该宣言上签了名。不久，上海被迫停战，他即参加“福建人民政府”并任文化部部长，继续反蒋抗日。失败后负笈英伦，在大英博物馆读书。1934年末，应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之邀，在莫斯科担任《救国日报》《全民月刊》编辑，后离苏去美。他旅美期间，得知“七七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为之激动万分，兴奋地宣布：“我等待的一天已经到了！”立即动身返国，投身抗日洪流，并赋诗明志：“敌强难免千回败，胜利当于最后求。”诗句表达了对持久抗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回国后力倡“巩固统一，抗日到底”，为团结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与秋原兄相识于战时陪都重庆。那时，他身兼参政员、《中央日报》副总主笔等要职，又在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身边工作，他完全可以飞黄腾达。可是，当他得知1945年美英苏三国签订了《雅尔塔密约》，其中有关蒙古和东北的条款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其后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又将这些条件强加给中国后，他非常气愤，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立即上书国民党最高当局，痛陈其危害，力主“此约万不可定”。他同时以个人名义发表《参政员胡秋原对中苏谈判之声明》，呼吁民众共同反对。他甚至致信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指出美国不应为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并在面见赫尔利时，义正词严驳斥其无理指责，使赫尔利不得不承认他遇到了“罕见的勇者”。所有这些使蒋介石极为震怒，下令撤除胡秋原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和《中央日报》副总主笔职务。秋原兄为了爱国横遭无情打击，而愈挫愈奋，继续进行斗争。他真不

愧是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迁居台湾后，尽管他的有些主张与我们相左，但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台湾独立”，推进祖国统一，赢得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尊敬。1988年春，他在台湾积极宣传中国要统一，并在揭露和痛斥“台独”的卖国行径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中国统一联盟”。并被推选为名誉主席。同年秋，他毅然冲破台湾当局长期阻挠两岸人士接触和讨论统一问题的禁令，前来大陆参观访问，成为台湾知名人士倡导两岸统一的第一人。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掀起了一股“胡秋原旋风”。在大陆访问期间，他受到国家领导人李先念、邓颖超的亲切接见及各界人士、各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我也得有机会与老友朝夕相处一个多月，促膝谈心，获益良多。最使我感动的是我陪同他访问北京大学，他向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谈到中国统一问题时说：“大陆在极短时间内，能制造原子弹、氢弹和使卫星上天，说明中国人能强；台湾经济建设，也为时不久即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说明中国人能富。如果我们中国能够统一，就很快可以富强起来！”话音一落，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也激动得热泪盈眶。此情此景，至今难忘。当他在大陆参观访问完毕，回台湾时，我与他依依不舍，写了《海峡精禽赤子心》一律送别，期盼“神州能‘超越’”。

对于他的“破冰”前行，两岸主张统一者莫不为之欢欣鼓舞，而“台独”分子却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甚至有人扬言要对他处以“死刑”，李登辉之流也声称要予以“法办”，但在国内外正义舆论压力下，最后“无法可办”，以开除国民党党籍和“限制两年不得离境”了之。我在送别秋原兄后，无时不以他的健康和安全为念。正在此时，就收到他亲笔写的一张条幅，上面书有一首和我的七律诗，表达其“不堪骨肉长冰炭，集思广益长安策”的心系祖国统一的迫切愿望以及坦荡无私的崇高精神境界，读后感佩无已。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被台湾当局限制两年不准离开台湾期限刚满，竟又以老病之身第二次前来大陆访问。到京不久，因新、旧病并发，住进协和医院治疗。卧病期间他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工作，医护人员与亲友见此情况，

无不为之感动。他病愈后，我再次欢送他回台湾，不意竟成永别。

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年间，我们经常电信往返，倾吐心曲，遥相呼应，直到他驾鹤西归。曾几何时，我主编的《论“台独”》一书在京出版，台湾朋友闻讯后即将该书在台出版，并由秋原兄亲自拨冗作序。他在序言中着重指出：“目前‘台独’的宣传甚多，批判‘台独’之书似以贾先生此著最为系统。……贾先生书中所说事实，我想有好多是此处本省人、外省人所不知的。知道以后，必不容少数不肖之徒自甘堕落，出卖台湾，以求个人荣利，貽祖宗和二千万台湾人以万世之羞。现在海峡学术出版社将此书在台重印，必能使此处爱国爱乡之人皆能了解‘台独’的真相，也必能坚决地与‘台独’进行斗争。”

记得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台湾光复五十周年之际，海峡两岸和海外专家学者数百人聚首北京民革中央礼堂，出席“胡秋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中华心——胡秋原政治文艺哲学文选》首发式。我受民革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先生委托，在会上做了题为《开展两岸学术交流，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发言，后收入两岸分别出版的《胡秋原学术思想研究》。

我与作家裴高才先生相识的机缘，是先阅其文后见其人。那是1995年秋，胡秋原著《中华心》在京出版不久，我看到《团结报》副刊上发表的裴先生所写书评——《爱心·忧心·诚心》一文后，非常兴奋，当即电传给台海彼岸的秋原兄。秋原兄告诉我：“裴先生是我们湖北老乡，还是我的黄陂小同乡。”稍后，我又读了他的长篇专著《田长霖传奇》，备感亲切。顿时，我们父子分别与田永谦、田长霖父子的过往浮现眼前，仿佛历历在目。

接下来，裴先生携此书稿来京请我作序，予也不文，实不敢言序。但我作为秋原兄的老友，素以良师益友事之，敬其人而爱其文，并有感于裴先生为创作此传，多年不辞辛劳，行走于海峡两岸，搜寻原始档案，并认真考订，三易其稿。故我不揣浅陋，就我所知，略抒所感，表达对秋原兄的深切怀念和对作者诚挚的谢意！

窃以为，这是一部当代“海归”学人文章报国的奋斗真史，它对于青少年了解历史，以史为鉴，追求人格、国格与学问的统一，颇具参考价值；对于弘扬我国知识分子爱国优良传统，促进两岸文化交流，以求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亦具有现实意义。

掩卷沉思，秋原兄高大的身影仿佛在我脑海里浮现，一首悼念他远行的挽诗一律不禁涌向笔端。诗云：

结识故乡数十春，私情公谊日俱深。

同参抗战流汗血，齐补金瓯献殷勤。

一身正气向兄学，两袖清风带我行。

半夜醒来惊噩梦，内心如捣泪满襟。

（作者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与名誉副主席）

“文艺自由”着先鞭

古远清

从湖北黄陂走出的文化名人、民族主义战士胡秋原，一生中几乎都在论战中度过。他从“第三种人”到既反“台独”又反“独台”那旋风曲戾的思想变迁，在两岸及香港甚烈，影响深远。

面对不仅是文学家，而且也是历史学家、思想家的胡秋原，作者笔下该如何描述？已为多位文化名人作传的裴高才，在这方面驾轻就熟。每个章节，无不呼应着时代的潮流，写出胡秋原敢着先鞭的种种事迹。作者目光敏锐，其中表现的史实、史裁，还有那史笔与史识，均值得称道。

大体而言，传记可分为自传与他传两种。裴高才所作是后者。由于著者与传主是两代人，对时代氛围缺乏感同身受的体会，因而只能从文献资料的梳理与田野调查入手。无论是追寻还是掘发，均离不开记忆。书中写的有关胡秋原的生平和记忆，也不禁勾起我结识胡秋原的回忆：

自研究台港文学以来，我和胡秋原先生有多次通信。他每有新著，也总是亲自题签赠我。那是在1995年，我应台湾“中国文艺协会”之邀做学术访问，便去拜见了仰慕已久的胡秋原先生。

当我到达台北新店市中央新村一座别墅式的房子时，胡先生出门迎接。他听我略带湖北口音，又是来自故乡的学者与武汉大学校友，连说分外亲切。那时，正值中秋佳节即将来临，有人端上一盘小巧玲珑的月饼，我们一边品尝一边攀谈起来。

我问胡先生：“您能否谈谈1988年回大陆的感想？”

提到这件事，胡先生不胜感慨地说：“我当时回大陆，意在与大陆交换中国统一问题的看法，然后回台湾报告各界人士。不料我的行动受到某些人的强烈敌视，直到回台后，政府官员和‘台独’人士还在‘立法院’和社会上高嚷要对我‘法办’，甚至还有自称西化派者之流要处我‘唯一死刑’。”想不到，胡先生当时冲破封锁会见李先念主席竟带来这样严重的后果。所谓判“死刑”云云，自然是一种恐吓。因为他们除了开除胡先生的国民党党籍、限他两年之内不得出境外，并无他“法”可“办”。而经过“中国统一联盟”毛铸伦主席等人的奔走和香港公正言论伸张正义后，恐吓者的瓦釜雷鸣也就哑然了。

我去台北时，正值国民党党内地区领导人候选人连署作业紧锣密鼓开张的时候，据说李登辉将成为国民党唯一地区领导人候选人。胡听到这个消息后说：“李登辉根本不是中国人。与其说他是‘台湾人’，不如说他是日本人。像这种搞‘台独’的人……说好听点是买办阶级，说坏一点是汉奸。前些时有些人搞‘我是台湾人’的大游行，和不久前统派举行的‘我是中国人’大游行唱对台戏。那些自称不是中国人的‘台独’分子，我要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你讲的是中国话，写的是中国字，过的是端午节和中秋节，难道你是荷兰人、葡萄牙人不成？”

胡秋原先生真正称得上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他一生至少写了三千万字的文章，出书一百多种。我问他：“大陆有许多学者在研究你，不知你有无将这些著作送回老家武汉的打算？”他爽快地回答说：“我愿全部捐给母校武汉大学。”胡先生1925年考入武昌大学物理系预科，以后改入中文系学习。我是晚辈，在1959年入武大中文系读书时，刘绶松教授讲《中国现代文学史》，当时就知道胡先生的大名，不过他那时因受鲁迅批评而被认为是“反面人物”。后来，胡秋原先生看到新时期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他的评价有所纠正，有人还替他做了翻案文章，认为胡秋原当年说的也不全错，倒是当时有人过于“左倾”，把文学上持不同意见的人打成“敌人”。谈到文艺问题，

胡先生兴致更浓地说：“文艺是团结人心的。文艺诚然有打击坏人的作用，但最后应唤起人类的同情心。文艺的任务是团结人心，让社会走上正轨。”在台湾 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胡秋原先生正是这样做的。当有人向进步作家陈映真先生扣“红帽子”时，胡先生挺身而出保护陈映真先生，认为乡土文学乃至“工农兵文学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反对当局对乡土文学作家进行政治迫害，从而将台湾文学引向健康的发展道路。

胡秋原先生是走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前列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在这一伟大事业中所建树的功勋已为两岸人民所公认。对他的文学思想，我个人在他主办的《中华杂志》及拙著《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中曾有专文论述。这一论述，是很不深入的，但胡先生不断给我鼓励。当我向他告别后，第二天他又派专人到我下榻的宾馆送来一封信：

远清先生：台岛相逢，且得畅谈，至以为快。因念先生前所嘱命之事，不可再迟，乃赶写出以报雅命。弟书法拙劣，故极力藏拙，先生之命不敢辞，幸不见笑。又先生云黄教授云武大欲得弟之著作，弟拟陆续寄去，但不知地点和收件人如何写，请黄先生示知为幸。旅安。

弟 胡秋原拜上 1995 年 8 月 29 日

这里所说“嘱命之事”，是指我向他求字。他念念不忘此事，这次果然给我送来他亲笔写的条幅。上有一首七律，诗曰：

抱投肝胆护危亡，辛苦初忘力短长。
同室操戈元海笑，红巾拭泪稼轩伤。
追随二霸成奇祸，回首自亲是正常。
雾色阴霾交互见，半分喜悦半悲凉。

采旧句勉答，远清教授雅嘱

八六老人胡秋原

此诗充分反映了胡秋原先生关怀祖国统一的忧患意识，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崇高精神境界，读后使人感佩不已。

记得那天胡先生与我道别，得知我不是从大陆直航，而是转道香港而来，且要再次回到香港中文大学工作时，他便嘱我在香港大学图书馆寻找他当年为抗日阵亡的十九路军将士写的碑文。我来去匆匆，一直未能查到。

裴高才笔下的胡秋原，也有类似的上述内容。此书虽不能说已达到“臻于至境”，但毕竟勾勒出传主一生大智大勇的闪光点，叙介了传主求学、治学与议场岁月，艺术地再现了胡秋原这位文坛奇士旋风曲戾、敢着先鞭的卓异历程。诸如：武汉“红都”“小超人”、莫斯科密谈牵红线、两岸“破冰”第一人等传主亲历的国共合作及两岸的大事件，以及叙介传主先后与瞿秋白、鲁迅、胡适、夏志清、李敖等笔战，笔墨官司打了70余载等；尤其是作者以地域文化的视角，解读“耕读传家”的家训与二程理学文化的熏陶，对传主毕生践行的“人格、民族与学问三大尊严”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写出了一个颇具特色的胡秋原，这值得大力肯定。

是为序。

（作者为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早期“保钓”举旗人

刘源俊

丙申阳春某日，我打开电脑收到裴高才先生大作《胡秋原：从抗战巨笔到两岸“破冰人”》的电子稿，顿时，秋公（同仁对胡秋原先生的尊称）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我眼前浮现——

我与秋公相识的机缘，首先是与其公子卜凯兄为台湾大学物理系的同班同学。后来留美时，我又因感奋秋公于《中华杂志》上的“保钓”号角与正义灼见，而参与了海外的“保钓”运动与爱国活动。1971年底秋公受邀访美，我乃得谒见，更有荣幸负责安排他于1972年元月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演“中国之前途”。我回台服务后，蒙秋公召集参与《中华杂志》编委会，复每月得亲炙秋公的风范与学问，受教良多。

“道德立大树，蚍蜉难撼；文章成中华，龙虎卧藏。”回首秋公百年，他提倡并奋不顾身践行人格、民族与学问三大尊严，令人高山仰止。关于维护民族尊严，至少有以下三件事特别值得一提：第一，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翌日，留学日本回国过暑假正准备上船返日的秋公，毅然决定放弃官费与未竟学业，留在中国抗日十四年，写文两三千万言。第二，1945年8月4日，眼看对日抗战即将胜利，身为国民政府参政员的秋公惊觉政府可能为联俄抗日而在“中苏谈判”中出卖蒙古部分地区的主权，发表《参政员胡秋原对中苏谈判的声明》反对，竟遭受“免本兼各职”的处分。第三，1970年8月10日，日本宣称钓鱼岛为“日本的领土”，引起轩然大波；